

·纪念马克思逝世 120 周年·

唯物史观的创立及其伟大意义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 120 周年而作

靳辉明

1983年3月,为悼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央举办了由上千人参加的纪念大会,在这个隆重的大会上,我作了题为《马克思在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的发言。我发言的开头一段话是:“一种思想体系对历史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同它所蕴涵的真理性成正比。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少风行一时的理论学说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可是,马克思主义却与时俱进,日益显示出它的真理的威力。在马克思长眠于海格特公墓以来的一百年中,马克思主义越出欧美,以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今天,我仍然以这段话来缅怀这位千年伟人。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1883年3月14日去世的,在3月17日马克思下葬时,参加吊唁的只有11人。在他生活了大半生的英国,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离去,但是,恩格斯在安葬马克思时的悼词似乎今天仍在人们的耳际回响。他向世界庄严地宣告:“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并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776页)一百多年过去了,恩格斯的话语,不断为实践所证明。在马克思逝世后,他的理论并没有被他的敌人所驳倒,相反地,却变成了伟大的现实,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个时期还出现了令资本主义世界胆战心惊的社会主义阵营。更让世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自豪的是,在千年之交马克思被西方媒体评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试问,还有什么更能使世界上千千万万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欢心鼓舞的呢?

我曾在《千年伟人马克思》一文中评论了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这次评选活动是由英国BBC广播公司在1999年10月开展的,评选结束后该公司宣布:人们评选的“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卡尔·马克思。爱因斯坦、牛顿和达尔文分列为第二、三、四名。并且指出:“尽管20世纪出现的一个又一个专制政权歪曲了马克思的本来思想,马克思作为一个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革命者所取得的成果,在今天仍然得到学术界的尊重。”接着,在12月,英国路透社在政、商、学术、艺术四界的名人中评选“千年伟人”,结果,马克思又同爱因斯坦和甘地入选。1999年12月19日《澳门日报》报导了这个消息,并刊登了三位“千年伟人”的大幅照片。该报说:“这样的调查当然不能十分科学地反映广泛的事件,但这次调查可以让我们看看一些名人的想法。”12月25日,台湾《中国时报》在报导时指出:“马克思有关资本积累及资本集中的说法,放在当今大购并潮的背景之下似乎更具意义,苏联瓦解、中国大陆也已改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年,这么多学者肯定马克思,的确有些出人意料。”还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洞见应该再度获得重视,他不应为其他人对其学说所作的引申背黑锅。”应该说,西方思想界所开展的这项活动和澳、台报纸的报导是客观、公允的。这项活动不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媒体,而是在资本主义媒体开展的,就更加发人深省。

不久前,2002年12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一篇题为《共产主义后的马克思》,又追述了这件事。这篇文章指出:在今天的欧洲和美国,以大学生和非专家为对象的关于马克思的书一直销量稳定,而且这方面的新书还在不断问世。文章列举了伦敦经济学院梅·德赛教授的新著《马

克思的报复》和去年8月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今天为什么要读马克思》。文章认为马克思以下四个方面的思想至关重要：第一，马克思认为社会将遵循某些既简单又包罗万象的运动定律，因而可以对其发展方向做长期的预言。第二，他认为这些规律无一例外都是经济性质的规律；塑造社会的唯一力量就是“物质生产的力量”。第三，他认为这些规律的表现形式始终是阶级斗争，直到历史的终结。第四，他认为在历史终结时，阶级和国家必将消亡，地球上将出现一个人间天堂。苏联式共产主义的错误在于它“抢跑”了，不能把苏联的错误归罪于马克思。文章说：马克思极具独创性地预见到资本主义制度惊人的生产能力。他预言，资本主义将把发明创新推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资本主义的巨大生产力将迫使其跨掉。关于资本主义的前景，你可以说，马克思错在时间的把握上；当资本主义走到尽头时，事实将证明他是对的。按照这种说法，马克思的许多观点都无法驳倒。他的许多假设、分析特点和思维习惯在西方学术界甚至更大领域都广为流传。”我之所以作这么多的引证，是想让人们看看西方学者和媒体对马克思的评价。这些看法，正是人们所说的正统的看法，特别是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的思想。尽管在表述上有所差异，但是它的确把握住了马克思学说的主要观点。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将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两个伟大发现：即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剥削的秘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特殊规律。这两个伟大发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马克思的理论力量和逻辑力量正是体现在他的这些基本思想上，并且赢得了千千万万人的尊重和敬仰。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会越来越发现它的真理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在坚持、发展、研究、创新中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如果马克思主义不与时俱进，不进行理论创新，就会终结其发展和生命力；如果否定或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思想，或者离开坚持片面地谈发展，不仅不能作到与时俱进，且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要义的背离，而貌合神离。

下面我想着重阐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因为它是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理论贡献，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列宁称之为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是“社会科学的别名”。赖有它，社会科学才真正变成科学。这些经典性论断，如果不从它的历史和理论内涵去把握，是很难深刻理解的。

综观人类思想史，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对自然认识的同时便开始了对自身的认识。而后者比前者要困难得多，复杂得多，漫长得多。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神”到“人”，再到用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去说明社会历史的、漫长的、曲折的发展进程。回溯人类的自我认识史便会发现，历史越是久远，人们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便越是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既不能正确说明自然界，更不能正确解释社会现象，而把这一切都归之于一种超自然的神秘的力量。“神”是当时人们回答历史之谜的总答案，神学历史观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这种情况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如此。这是人类对自己历史认识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它不仅是物质生产力和人们精神世界发展的产物，而且也是人们的需要，特别是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需要。例如，中国的“天命”、“天道”观，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帝王将相的出现，都是由上天安排好了的。其兴，必有祯祥；其亡，必有妖孽。在西方则认为，上帝是世界万物的最高“主宰”，“一切现存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托马斯·阿奎那）。说法不同，实质则一，都是在宣扬一种唯心主义的神学历史观。尽管历史上有许多哲学家和无神论者，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西方的普罗塔哥拉）和“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中国的仲长统）的卓越见解与之抗衡，但也不能根本抹掉这层覆盖在人类社会机体上的神学阴影。但是，社会实践是强大的推动力，随着工商业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认识视野的进一步扩展，冲破这种神学历史观也是不可避免的。

“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人道主义思潮，标志着从“神”到“人”的历史性转折。这一历史观的重大转折，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事实之中，正如恩格斯所说，即使宗教包含的某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也都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至于作为其对立物

应运而生的人道主义思潮,就更是如此了。人道主义也称人文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始自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它表现为古典学术研究的形式,实际是以古典文化对抗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含有鲜明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宗教神学的意义。在封建主义和神权主义的统治下,为人的存在争一席之地。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实力的增长,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道主义不仅得到充分的理论论证,而且以“人权宣言”的形式在政治上完全地被肯定。这时,“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内容的人道主义,突出表现为“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自由、平等是人所固有的,是人按其本性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这种以自然权利和自然法为依据,以“人权”形式出现的人道主义,虽然并非科学,但没有妨碍它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而正是这种理论有效地满足了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要求,在当时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对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历史上的人道主义在理论上的致命弱点,是离开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来谈人和人性,赋予“人”以普遍的抽象形式,并把这种抽象的人作为自己学说的中心和出发点,作为说明社会历史现象的主要原则。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在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使人道主义更具哲学的思辨性和抽象性,把人道主义变成了一种博爱主义。而以这种人本主义哲学为理论依据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则把社会主义也变成一种抽象的难以捉摸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他们标榜的抽象“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一般人的利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所以,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尽管是人类认识史的巨大进步,但它不可能成为说明社会历史的真正科学的学说。

从总体来说,不论是神学历史观还是人道主义历史观,实质都是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唯心史观。因为,不论是“神”还是“人”,都是被抽象化了的观念的产物,并把它们“描述成历史的动力”(同上书,第130页)。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更是把这些形形色色的认识抽象化为绝对观念,认为这种绝对观念才是世界万物的终极动因。黑格尔不仅使这种理论更加精致,而且还赋予它以辩证的因素。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唯心主义历史观统治着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

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是在前人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并回答时代问题的前提下实现的。马克思所面临的时代课题,首先是“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这所建筑物的上层”(《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248页),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为社会历史认识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指导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同时,也用这种科学历史观去指导他的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

马克思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因此,他不可能不受当时德国精神环境的影响,特别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但是,他通过自己的理论探索,终于找到了摆脱这种理论困境的出路。这就是,他超越关于“人”的抽象议论,而把自己研究的基点放在探讨“现实的人”和“人的世界”。马克思说:这种历史观所由出发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马克思正是通过研究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这种活动赖以进行的社会关系,才一步步地接近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究竟把握了什么,才使他能以实现这个伟大发现的呢?可以肯定地说,关键问题是在于他捕捉住了生产关系的重要思想。众所周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并阐明了生产力的概念,但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生产关系的思想。这是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按照列宁的看法,马克思在1845年写成的《神圣家族》已经“接近”了唯物史观的这一最基本的思想。接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之作全面的阐发。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精神交往不过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而在各种物质关系中生产关系又是最基本的,它不仅是政治制度和“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也是“一切实际的财

产关系的真实基础”。这样,马克思就从人们的各种关系中划分出了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关系。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不仅对生产力诸因素结合的性质和方式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而且有可能揭明生产过程本身内在结构,揭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据此,进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动力和运动规律,解答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历史之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在欧洲革命风暴时期得到实践的验证,直到1859年,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才得到了经典性的表述。这里,我想将其最基本思想引证如下。

马克思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不论是文字还是思想内容,都堪称经典佳作,千古绝唱。其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下面只着重强调几点:1. 马克思完全改变了以往用“神”、“人”和“观念”说明社会历史的唯心史观,而是把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作为历史的发源地,把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作为说明人和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依据,从而破天荒第一次把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由于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科学揭示,不仅提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概念,而且其含义同先前哲学的存在与意识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社会存在就是人们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物质利益的总称,人们的意识和观念正是由此而决定的。恩格斯在谈到这一点时说,“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还说,“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同上书,第39、38页)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实现历史观伟大变革的立足点。

2. 马克思把物质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把与之共生、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关系、生产关系视为物质生产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进而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由此延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的、观念的上层建筑,揭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有机构成和基本矛盾。列宁在说明这一进程时指出:“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9页)尽管社会活动有人的参与,尽管个人会对历史发生一定影响,但他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决定社会面貌和历史发展的是物质生产和经济因素。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像自然界运动一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遵循其内在的必然的法则。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最核心的思想。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科学历史观时,主要是针对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历史唯心主义,所以他们着重强调的是经济的决定作用,或者说强调了社会本体论的一面,而对政治、观念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则阐述得不够,于是,后来便被

有些人将这一原理曲解为“经济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恩格斯在晚年的通信中,不止一次地阐明了思想、观念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阐明了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自己学说的批判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列宁是这样评价的,他说:“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可见,只有坚持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才不会导致或者否定人的理性的作用,或者否定决定论的错误。

3. 与此相联系,马克思揭明了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在历史上演进的几个阶段。这个重要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得到初步阐发。马克思认为,分工(生产力水平的表现)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70页)在《序言》中,马克思作了更为确切的表述,指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是一致的。我想强调以下几点:第一,这里讲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它是依据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划分的,其主要标准是所有制关系。只有依据这个标准才能把历史发展阶段、大的时代区别开来。所以,这是历史的最基本的划分。正如列宁所说,要研究社会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第二,马克思阐述的这个原理,具有普遍意义。马克思虽然生活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但他考察的是人类全部历史,不仅包括西方,而且也包括东方。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至今仍有不同理解,需要进一步研究,但这说明马克思的研究是把东方社会包括在内的。由于东方社会确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特点,所以马克思晚年又专门对之进行了探讨。马克思发现的这个重要原理,已经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所证明。第三,任何科学真理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也是如此。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遵循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有着自己特殊的表现形式,亚洲不同于欧洲,东亚又不同于西亚。不仅如此,有的民族和国家受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影响,还可能出现跳跃式的发展,比如,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就越过奴隶制阶段而建立了封建的国家。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表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生动性,而不会否定历史规律的普遍性。马克思特别重视对每个历史时期本身规律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科学意义在于,阐明调节这个社会机体的产生、存在、发展和死亡,以及这一机体由另一更高的机体来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

4. 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不仅在历史观上实现了伟大变革,而且在社会实践上得出非常革命的结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社会的变革就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的结果。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恩格斯在讲到马克思《序言》中这一思想时,满怀革命激情地说,“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恩格斯讲的是社会发展“远景”,是过程和趋势,而不是立即实现的事实。革命辩证法总是从事物的肯定中看到否定的因素,资本主义制度无论现在如何强大,但它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迟早要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这是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就在于,依据客观条件适时地推动这一进程。

在《序言》中,马克思谈到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

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这个问题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际问题,只能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上去考察解决的任务是否已经成熟,以及如何去解决它。不能把马克思上述思想绝对化,也不能把他的完整的意思割裂开来。马克思讲的比较确切,比较全面,他在讲了两个“决不会”后,接着指出,一个历史任务,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成熟”不是一个静止的点,而是一个逐步达到的过程。所以,不能根据两个“决不会”得出社会主义搞早了或超越历史阶段的结论。其实,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阐明了类似的思想,他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指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116页)按照上述观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决不是幻想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物质条件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已经创造了解决这种对抗的条件,而且已经产生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所以,社会主义运动和20世纪社会主义的存在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充分的客观根据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不应该搞,而是由于自身犯错误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科学性和革命性是高度统一的,理论越是彻底,越是能体现它的革命精神,必须以革命的批判的态度领会马克思的学说。在这方面,恩格斯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

从上述可见,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抽掉它便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创立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首先,唯物史观的创立,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伟大变革,使社会科学真正变成科学。人们可以曲解它,也可以不承认它,但是还不可能用一种所谓新的学说去代替它,至少在现在是如此。正如列宁所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其次,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才使社会主义成为真正的科学。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的思想和研究工作发生了质的飞跃。众所周知,马克思40年代下半期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但后来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他对经济学的研究才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商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揭露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正如列宁所说,《资本论》就是一部大写的哲学。这两大发现,就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对此作了深刻地阐明,并且指出,没有德国的哲学,就不会有现代社会主义。同样,要正确而深刻地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也不能没有哲学思维。再次,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指导当今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不论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还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把握,都必须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指导,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和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只有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使我们坚定信念,看清方向,认清本质,头脑清醒。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武器,在面对21世纪严峻形势下,在我国社会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下,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指导我们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目标。

今天,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最好的礼物就是学习、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正确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继承它的革命的批判精神,把马克思开创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责任编辑:伍 思)